

共和国

# 人物档案

## 共和国第一批 外交官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共和国人物档案

# 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

何 明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何明主编.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1

(共和国人物档案)

ISBN 978-7-5000-8021-3

I. ①共… II. ①何… III. ①外交人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435 号

**策划编辑: 韩知更**

**责任编辑: 王 宇**

**图片编辑: 王 绚**

**版式设计: 史乐瑞**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5606)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术设计中心排版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6.25 字数: 165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00-8021-3

定价: 16.00 元

## 《共和国人物档案》编委会

主 编：何 明

编 委：何 明 江 英 范承斌 张立新 楼 劲 汤 涛

王小明 毛 胜 吴伟峰 钟 科 钟 文 钟 社

本书编著者：武蓬勃 晋江艳



# 前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为缅怀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我们特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编写了《共和国人物档案》丛书。

本丛书共分九册。《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收录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员》收录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主任、各院院长、各署署长、各局局长；《共和国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收录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副部长、主要职能司正职人员和第一任驻外大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分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三册，收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共和国首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收录新中国成立初期六大行政区，现存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20世纪80年代后新建海南省、新增直辖市重庆市）党政首任主要领导。

本丛书具有鲜明特色。一是主要人物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各方面杰出人物，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二是截取人物经历的某些片段进行描述，主要是对其任期内或其在所领导地区内作出的贡献进行实录，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三是有些人物，如科学家主要描述

其科学贡献，在保证体例统一的前提下突出了个性；四是针对主要人物同一时期在许多部门任职，为避免内容重复，在介绍时各有侧重，如中央人民政府成员主要描述其在建设新中国中的贡献，全国政协常委主要描述其在创立新中国中的贡献；五是个别后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违反党纪国法的人物，对其曾经所作的贡献和所犯错误或罪行作客观介绍。

本书部分图片由新华社供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体例特别，其中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共和国人物档案》编委会

# 目 录

|                   |    |
|-------------------|----|
| 周恩来：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部长    | 1  |
| 王稼祥：忠诚的战士 优秀的外交家  | 7  |
| 李克农：活跃在特殊的外交战线上   | 11 |
| 章汉夫：一生为党工作的外交家    | 15 |
| 伍修权：“文武双全”的杰出外交家  | 18 |
| 张闻天：推行和平外交的“红色教授” | 22 |
| 王炳南：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外交官   | 26 |
| 宦 乡：中国的“基辛格”      | 30 |
| 柯柏年：博学多才的外交官      | 33 |
| 董越千：第一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   | 36 |
| 龚 澎：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 39 |
| 乔冠华：我们的乔老爷        | 42 |
| 耿 飏：敢说真话的好大使      | 45 |
| 王幼平：共和国任所最多的驻外使节  | 49 |
| 谭希林：从指挥员到外交官      | 52 |
| 彭明治：文韬武略的驻波兰大使    | 56 |
| 姚仲明：将军外交家         | 59 |
| 王任叔：学者型外交家        | 62 |



第一批外交官





|                  |    |
|------------------|----|
| 黄 镇：才华横溢的外交家     | 65 |
| 倪志亮：共和国第一任驻朝鲜大使  | 69 |
| 袁仲贤：英年早逝的大使      | 72 |
| 姬鹏飞：军医大使         | 75 |
| 韩念龙：杰出的外交家       | 79 |
| 曹祥仁：破译高手当大使      | 82 |
| 冯 铨：兢兢业业战斗的一生    | 85 |
| 吉雅泰：共和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大使 | 88 |

## 周恩来：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1898~1976），1898年3月5日生，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1921年春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10年春入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学习。1913年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1917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为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并组织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6月与赵世炎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央执委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随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6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旅欧组织。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代理执行部部长。1924年9月回国，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1926年初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6年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1927年2月起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列席政治局常委会；5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其间：5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任，7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发动后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参谋团委员。1927年8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其间，曾兼任中共中央军事科科长。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后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常委、部长、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主任、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等职。1934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为中共中央负责军事行动的三人小组成员。1935年11月至1936年12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并负责军委组织局工作，1935年1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其间：1936年12月起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6年12月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展工作。1937年2月至9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进行多次谈判。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历任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除西北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1945年8月起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重庆国共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后，率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初起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执行国共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1946年11月回到解放区，1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1947年8月起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1949年6月起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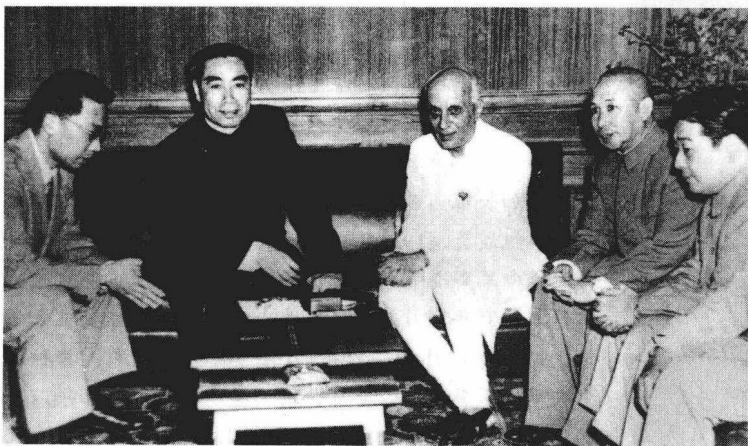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54年9月至1976年1月任国务院总理。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建国初期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部长。1949年10月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5年1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起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27年8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8月至11月任职）、委员（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职），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1927年5月至6月任职）、临时常委（1927年7月至8月任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7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职），第六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职）、第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主任、书记，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

### “外交无小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交部随之组建。作为外交部长，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外交人员的筛选问题。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组工作人

员的基础上挑选外，他又从中央其他各部门的干部、军队的高中级将领、地方领导干部以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选调了一部分人员。不仅考虑人选，他还“边招人边工作”，到1949年10月底，



1954年6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印度总理J. 尼赫鲁举行会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构想

仅一个月的时间，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国送达开国公告和公函的任务，相继办理了10个国家与共和国建交的有关事项，同时拟订了外交部组织条例、确定了外交部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等。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召开成立大会。晚上8时整，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二楼大厅。在几张旧桌子拼成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农说：“同志们，我们的成



1955年4月，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发言

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会场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大家不清楚李克农有什么错，李克农也茫然。周恩来继续说道：“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上任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会场气氛立刻又变得轻松起来。

接着，周恩来微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有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他拿起花名册，依次点着各位的名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从司长到科员一个都不落。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第二个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曾经在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第三个是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第四个是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即夏衍）。另外，还有乔冠华、龚澎、浦三、龚普生、董越千、宦乡、柯柏年、赖亚力……周恩来将外交人员花名册上的同志一个一个都点到了，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

共和国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从军队中

选调来的，为使大家尽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来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的驻华外交官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以及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除此之外，还组织他们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和跳舞等。

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来专门组织外交人员躲在屏风后面观摩了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接见了大家，人们异常兴奋，七嘴八舌地向毛泽东问了许多问题。当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时，毛泽东说，现在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举例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不照样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绩卓著吗？他幽默地对大家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这时周恩来也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接见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给大家作了动员讲话，最后他郑重地

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首届驻外大使经过严格培训，纷纷走马上任。他们谨记周恩来的谆谆教导，走过风雨，走过辉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今天，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教诲还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中国驻外使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47年和1949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印度、中国人民通过斗争相继取得独立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953年九十月间，中、印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两国政府代表于12月就解决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谈判。

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以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团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周恩来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一天一天地会好起来。某些业已成熟但仍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国时确立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赖嘉文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经过4个月的协商，双方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写进了该协定的前言，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进国与国之间签署的正式文件。

同年6月，周恩来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了印度、缅甸。6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其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

规定了有关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

紧接着，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于6月28日至29日访问缅甸。6月29日，双方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宣布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赞扬，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和赞同。

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引申和发展，并被吸纳进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之中。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着。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 亮相日内瓦

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上决定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英、中五国全程参加会议。会议委托苏联政府将这个信息告知了中国。周恩来决定接受邀请，并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这是共和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会前，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为会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4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4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4月26日，会议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召开。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朝鲜问题。正如周恩来在会前就预计到的那样，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形

成了一个“僵局”。尽管这次讨论长达51天，但最终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然而在这次讨论上，周恩来表现出的那种宽阔的政治家胸怀、合情合理的主张和机智灵活的才干，给与会者以至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当会议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就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提出6点建议，推动了整个会议的进展，终于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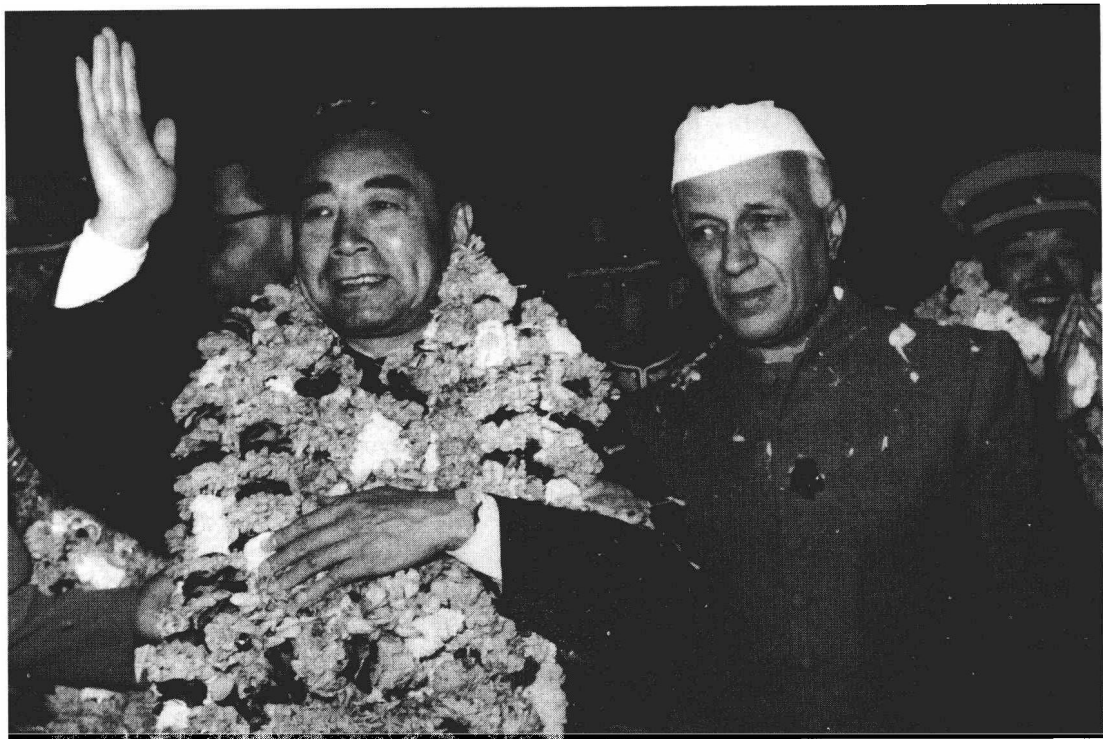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代表团带了一些影片播放。代表团先是播放了一部国庆大阅兵的纪录片，想让世界看到共和国正在步入强大。但是一些人士看过后却说，中国要搞军国主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代表团播放了另一部影片，就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工作人员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戏剧，就准备了一些宣传资料，用很详细的英文介绍越剧，介绍梁祝的故事，足足有好几页纸。宣传资料的最终稿被周恩来改得只有一句话：“请大家看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片最后放映时，整个大厅挤满了人，超出了主

办者的预料。影片结束后，所有人都默不作声，都沉浸在那种悲剧的气氛里，稍后，所有人都起立，为中国有这么好的电影、这么好的文化热烈鼓掌。这是周恩来日内瓦外交中很小但也是异常光彩的一笔。

### 万隆会议三次“力挽狂澜”

为了在外交工作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周恩来除了着手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外，更加重视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1954年四五月间，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倡召开亚非国家会议，这个提议得到了24个亚非国家的同意，中国也接受了邀请，决定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在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开幕了。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封锁，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



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抵达新德里时，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会议上3次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的战略方案。

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恩来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般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亚非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印度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正式达成中立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被打破，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攻击共产主义。贾马利的发言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大会的形势急剧恶化。

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发表了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打破了美国妄图让万隆会议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周恩来巧妙的语言既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又给与会者留下了一种自我克制、通情达理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中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来以他的真诚和机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秘

密会议阶段。这个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充当了第二次进攻的“号手”，当时锡兰的反共立场是非常极端的。

但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么明显的变化呢？原来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才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消除了科特拉瓦拉的误解。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得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宽宏大量地建议把有人不喜欢的“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使会议中体现的那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深深地印在了人们心中。它揭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性的新的一页。从万隆会议结束到1959年底，已经先后有11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亚非会议为共和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

由于周恩来政务活动过于繁忙，自1958年起，外交部部长一职交予陈毅担任。但是周恩来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并没有停止，他对共和国外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 王稼祥：忠诚的战士 优秀的外交家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稼蔷，1906年8月15日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和《红旗报》、《实话》编委会成员、主笔，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赴苏联，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次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宣传部代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八、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

### 随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春，来自各解放区的会议代表陆续到达西柏坡，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的王稼祥也携夫人朱仲丽来到这里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统治地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于是，共和国开国的筹备工作提上了日程。



为了直接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共和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赴莫斯科同苏共商谈筹建共和国的有关事宜，并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这是中苏两党间进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意义十分重大。由于王稼祥长期在苏学习和工作，经验多、见识广，为此，中央将王稼祥从东北调回，随刘少奇访苏。

6月21日，刘少奇、王稼祥、邓力群、戈宝权等从北平（今北京）清华园车站出发北上，陪同的还有苏联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柯瓦廖夫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代表团经沈阳时带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于6月26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中苏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斯大林对贷款、派遣专家和海、空军援助等问题，初步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会谈。

到苏后，刘少奇一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共和国成立的方针政策以及新的中苏关系。斯大林基本赞同中共成立共和国的方针和政策，表示愿意对共和国建设提供帮助。同时，毛泽东6月30日在国内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实行

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莫斯科，刘少奇7月4日向斯大林特别解释了“一边倒”政策。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

7月11日，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就会予以承认。同时，他还承认了1945年苏联同中华民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和平条约》是不平等的，在共和国成立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和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就这样在共和国成立前确定了下来。

由于在长征中组织部队疏散时，王稼祥被敌军空袭炸伤且长期没有治愈，在这次访苏期间，他住进皇宫医院治病。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领导戈宝权、徐介藩等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

8月14日，刘少奇回国，王稼祥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刘少奇这次率代表团访苏取得了重要成果，除了有以柯瓦廖夫为首的220名苏联专家随行回国外，斯大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建议，也对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解放新疆问题，苏方的建议也受到中共重视；另外，中苏双方就苏联向共和国提供3亿美元的借款事宜也达成了初步协议。

### 不辱驻苏联大使使命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约王稼祥单独谈话。毛泽东说：“有两个工作，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驻苏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间都很紧迫，两个工作都很重要，看你愿意做哪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王稼祥最终选择了驻苏联大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晚9时45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致电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周恩来于10月3日发出复电，电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这样，中苏两国正式建交。苏联方面任命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中国方面任命王稼祥为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0月20日晚，王稼祥大使一行乘专列火车由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100多人前往车站送行。王稼祥大使的随行人员中有公使衔参赞曾涌泉、武官边章五、秘书张观等。

10月23日下午两点半，专列抵达苏联境内的奥特波尔站，苏联赤塔州主席及苏联外交部驻赤塔外交特派员前来迎接，并在车站餐厅举行了欢迎宴会。10月31日清晨，列车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王稼祥受到苏联超出常规的礼遇。按苏联常规礼节，外国大使到任，只有外交部交际司司长迎接，而这次为接待中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辛尼格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驻苏联使节和外交官均到车站欢迎，引起了广泛关注。

王稼祥在车站发表了演讲。他说：“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国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他还说：“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资格，当尽最大努力，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以保卫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

11月1日下午，王稼祥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他向葛罗米柯递交了国书副本及颂词副本，以及使馆将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外交官员名单。王稼祥此行携带的这份“国字第壹号”国书，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署的。很快，苏方向王稼祥介绍了递交国书仪式的程序。11月3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递交国书仪式，王稼祥宣读颂词后，将国书呈递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从此，王稼祥在莫斯科既身负驻苏大使的重任，又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兼管对东欧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苏共



中央接洽有关两党的事务。驻苏联大使馆是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馆，王稼祥对使馆的建设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经常组织使馆人员学习包括涉外礼节、礼宾程序在内的外交业务，还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使馆人员进行有关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方面的授课。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诞辰，毛泽东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王稼祥十分注意提高共和国和毛泽东的国际威望。为了庆祝毛泽东访苏成功，王稼祥大使暨夫人朱仲丽举行了盛大的外交宴会。为了使斯大林能应邀出席这次宴会，王稼祥特意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经过积极交涉和全力争取，斯大林终于接受邀请，打破了自己历来不出席外国使节宴会的惯例，第一次出席了王稼祥大使夫妇的外交宴会，给毛泽东访苏成功增加了特殊意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页。

1951年2月，王稼祥大使圆满完成在驻苏联使馆的工作任务，奉调回国。

### 党际外交的开拓者

195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同时仍兼任外交部副部长至1959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多次出访苏联、东欧等国，出席有关国际会议，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稼祥在外交工作中，一贯坚持平等自主、和平共处的原则。1951年5月，他到莫斯科城郊别墅会见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了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设想，其理由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王稼祥从反对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立场出发，和缓但明确无误地说：“我们不能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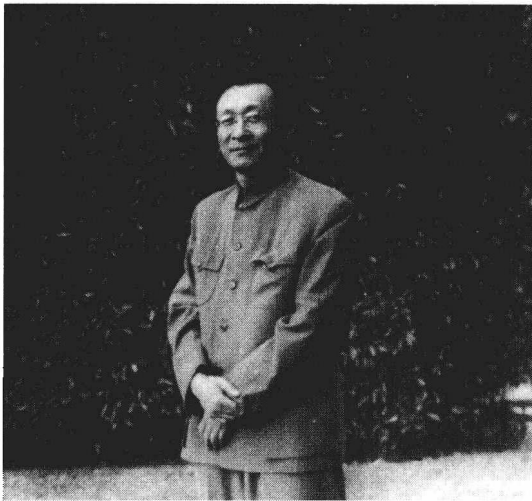
1956年8月，波兰党政治局决定由哥穆尔卡出任第一书记，引起苏联的不安。赫鲁晓夫向波兰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被波兰党以将召开八

中全会为由拒绝，于是驻波苏军开始调动，试图武装干涉波兰内政，随后包围华沙。王稼祥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他说，选这个人或那个人，这是一个独立的党的内部问题，决不应受到外来干涉，更何况是用武力来干涉，这简直是背弃社会主义。

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同全世界的60多个共产党建立了关系。这同王稼祥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王稼祥主持下的对外联络工作，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信赖和敬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和地位。

1959年10月，王稼祥在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因为对自己国家情况最熟悉的是本国的共产党，吸收兄弟党的经验和同兄弟党交换意见是有意义的，但兄弟党的经验和意见只能做参考。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同时，担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通过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形成了改进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些想法。王稼祥和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向负责中央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递交了《党内通讯》形式的信件。信中，他明确主张，应正确全面地阐明我国



1955年4月4日，王稼祥主持召开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图为会议期间的王稼祥